

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二)

曹志源

統帥親臨檢閱

青年軍訓練的高潮

一、統帥檢閱得觀威儀

不論是戰時的士兵訓練或戰後的軍官教育，青年軍都有令人滿意的表現。因為，我國社會傳統上是輕視和害怕軍人的，於是身家清白的人，都不願意去當兵，所謂「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當兵或從軍在流行的土話中叫做「吃糧」，是沒有受過教育找不到正當職業，又無恆產的人幹的，所謂「好吃懶做去當兵！」、「去吃糧！」這是多麼不名譽的事和不幸的觀念。然而却風行在我國社會，根深蒂固。這樣，國防還能堅強起來嗎？難怪歷史上下外侮頻仍，國恥不絕，造成政治永不安定，經濟永難發展。

筆者後來研讀各國歷史，發現和認定一國之強盛，建基於政治之安定，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的國家，政治便難於安定。政治不安定，經濟便不可能有發展進步。經濟不能在安定的政治環境和賢能的政府領導之下有計畫的競爭發展，人民生

活便不可能改善。結果是天災人禍，雞犬不寧，不是逃荒討乞，便是逃難搶奪。這是我國和其他許多未開發國家的通常命運和現象。其根本原因發生在人民不願，也無正當途徑可循去替國家社會服「役」，而「兵役」是國家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的一種「役」，也就是義務或天職。而社會如此輕視、鄙視，除了走投無路的人，還有誰願意去服那種危險的兵役呢！

青年軍可說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一次大規模自動自發的從軍運動，從社會的基層發作，風起雲湧，悲愴壯烈。一讀到那號召從軍的悲壯史詩：「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再看那半壁江山，受敵人鐵蹄踐踏，無辜而善良的同胞，被敵人殘酷的刺刀殺害；敵機轟炸，虛舍為墟。姦淫擄掠，人人自危！有良知的人都不忍袖手旁觀的。所以這次投筆從戎的人，大多是屬於這種良知未泯的人，有大學教授、大學生，有公務人員，有家境優裕的公子哥兒，自然最大部份來自平民羣衆，都是在同仇敵愾的心情下從軍，所以大家的教育程度較傳統抽拉的壯丁為高。受起訓來，不但在思想觀念上易於溝通統一，戰

略戰術、武器使用上也易於瞭解接受。

當我們入營後，便因日軍佔了獨山，威脅貴陽而加緊於二個月內完成士兵戰鬥教育，使盟軍將領如美國魏德邁將軍都讚不絕口。我們當時的訓練方針是「手腦並用，術德兼修」。在當時那種國困民窮的環境下，我們得自己開山闢地修築營房、操場，清潔環境、煮飯洗衣、縫補破爛衣服、編製草鞋。白天最寶貴的時間多是上午上課，下午出操打野外，實在是一種別開生面的團體生活，也證明人類對生活環境和物質享受的程度是可以適應調整的。我個人自認這一年多的軍事訓練，對身心的發展，有極大的幫助。我後來歷高中、大學、研究院百考不敗，浮沉宦海而表現不凡，副至於久廢筆硯，輟學十餘年後淬勵奮發，完成博士學位，在彼邦大學執教十餘年而深得學生愛戴，票選我為優秀教授等等，也可說是拜軍事訓練之賜。

我們訓練的最高潮似乎是統帥蔣公的親臨校閱。那時抗戰業已勝利，全國還在狂歡的震撼中，蔣公以國民政府主席兼三軍統帥的身份，特別於政府遷都以前，在日理萬機之餘，分赴各地檢

閱青年軍部隊。吾人於全民抗戰勝利，國家國際地位提高，不平等條約廢除，復興在望之時，得親聆統帥訓示，親見領袖威儀，自然是令人十分歡欣鼓舞的事。

記得他來貴陽檢閱我二〇五師時，消息雖早已傳出，但上級並沒有宣佈何時要來。而各單位操練之嚴，和各級長官督察之勤，使大家都可想像這一次大概將主席真是要來了。我們把最好的皮鞋和服裝留着不用，以待領袖校閱。其誠摯之感情流露，實不亞於子弟之對父兄。但大家又知道領袖於戰後正忙於內政外交，且還都在即，深怕屆時因公忙不克蒞臨，那才是失望呢！後來，全師各單位包括六一三、六一四、六一五各團，和炮兵、工兵、通訊、輜重營等直屬部隊，都集中到離貴陽百餘里外的麥家橋營地。直到校閱的前一天，大家還是不知道統帥是否真會光臨。但每一個人企盼的心情都是熱烈的、緊張的，士氣也是高昂的。

筆者個人意外地有幸於校閱前一天便確知統帥業已駕到。那是生平一件難忘的興奮大事，值得一提。記得那天下午，當全師各部隊在閱兵指揮官劉樹勛將軍調督下舉行預校演習完畢，宣佈各回營地晚點休息，準於明晨十時原地集合時，只見一輛小型吉甫車從司令臺急速地朝我連隊伍駛來，一位英俊的年輕少將軍官下車請連長把我找出，謂家叔聖芬先生已隨節抵筑（時家叔任主席侍從秘書），以時間倉促，盼即赴黔靈山行邸一晤。並代我請假數小時，隨即登車同往。黔靈山位於貴陽郊外二十里，林木葱鬱，風景和形勢

極佳，到達時已近黃昏，但見車水馬龍，將星雲集，而警衛森嚴。該軍官引我於會客室見到家叔，歡愉興奮之情，不可言喻！我已從農村頑童一變而為革命軍人。家叔自大學畢業後，即逢蘆溝橋七七事變，離家報國，萍踪萬里，迄未一返家園，真是「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其間人事滄桑，不堪回首，尤以祖母仙逝，亦未克奔喪返里。乍見之下，千言萬語真不知從何談起，事實上，時間亦不容許我叔姪促膝長談啊！家叔顯然為我的年少請纓從事報國而感到驕傲和光榮，談話進行間，他看看手錶說：「你在這裡坐一會兒，我去試一試看主席現在有無空的時間，好讓你去向他致敬。」我聽到這話，心幾乎跳到口邊，經過一陣緊張後，情緒恢復鎮定，想到我這年輕「列兵」，如真能在這裡單獨謁見「統帥」，不但是個人一己光榮，也實在是軍中的佳話啊！無如待家叔返回會客室時，告以主席猶忙於接見軍政要員未畢，恐難有機會矣！「佳話」頓成泡影。然五年以後，筆者在臺任青年節大會主席時，曾有幸親迎先總統蔣公蒞三軍球場訓話。次年，又以臺大學生代表身份，經教育部考選出席聯合國青年領袖講習會，於出國前意外地蒙蔣公召見，親切垂詢，仁慈有如親長，隨即使我想起黔靈山的往事，和六年來世事的變化，不禁百感交集，不能自己。

第二天上午，豔陽高照，是「天無三日晴」的貴州很難見的好天氣。一萬多名於國家最危難時響應領袖號召從軍報國的青年，在經過一年多嚴格訓練以後，可說是士飽馬騰，軍容壯盛。我

們一早便集合在當年憑雙手以圓鐵十字鎗開闢的廣大操場上，恭候統帥蒞臨。擴音器播出雄壯的軍樂和凱歌，令人激動。約十時許，只見一長列車輛，由遠而近，我們敬愛的統帥蔣公，在文武百官陪同下，威儀萬千地出現在司令臺上。樂隊奏出崇戎曲，騎着大馬，肅立在場地中央的閱兵指揮官劉樹勛將軍一聲口令，揭開了這歷史性的閱兵序幕。然後他下馬奔向司令臺前報告受校兵種和人數，恭請檢閱。先是統帥乘敞車駛過陳列整齊，頂天立地鋼鐵一般的隊伍，頻頻舉手為禮，不斷頷首稱好。然後分列式進行，士兵一連隊接一連隊地，以虔敬的心情和健美的姿態，正步走過臺前，向統帥致敬，真是氣宇非凡，個個雄赳赳，氣昂昂，象徵着國家和個人的光明遠景，壯觀極了。

檢閱完畢，恭聆訓話，語多勵勉。然後會餐，餐畢復親臨若干桌席視察致意，垂詢生活情形，溫和關切之情，有如家長。臨別之際，猶依依不捨地走向擴音器前，向大家作最後的叮嚀。他說：「親愛的青年遠征軍士兵子弟們：我們今天抗戰已經勝利了，國家名義上也已取得了五強之一的地位。但百廢待舉，而內憂未止，今後建國的工作是很艱難的。我今年已過花甲，最多再能領導你們二十年。希望你們大家都珍惜自己年輕的時光，加強學習，充實技能，鍛鍊體魄，以備將來擔當重大的建國任務……」情意拳拳，令人心折。當時大家的心情是沉重而樂觀的，以為再有二十年的時光在他的領導下從事和平建國，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必可奠定無疑。無如內亂擴大

，一般知識份子心存幻想，誤信中共宣傳，使勝利的成果瞬間消失，造成中華民國歷史上最大的巨變，使大陸十億同胞，三十年來經歷人類歷史上最殘酷最瘋狂的暴政。實在都是因為沒有遵循蔣公的策略路線，未能團結力行的結果。痛定思痛，豈可一日或忘？好在「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今後如能穩紮穩打，以建設臺灣的經驗和成果，徐徐奉獻大陸同胞，則祖國重光必有日焉！

二、陽明洞受革命洗禮

蔣主席檢閱過後不久，我師奉命組織一個復員幹部訓練班，由每一個連隊考核選薦一名最優秀的兵，去陽明洞研討即將復員的事宜和復員後的聯繫問題，由師長主持。據說這是蔣主席駐節黔靈山時的指示，認為這一批於抗戰最危急的時候請纓報國的熱血青年，不應因復員退役而散失，應妥加聯繫照顧，使成爲建軍建國，改造社會風習的基層幹部。用心是良苦的。一日午餐後，值勤的排長（已忘其名）轉告連長有請，去到連長室，他鄭重地告訴我這回事，說連上經過他、政治指導員和各位排長的推薦投票，選定了我去陽明洞受訓。

陽明洞位於離貴陽百餘里的修文縣。是明朝大儒王陽明（守仁）先生於正德初年開罪權要後被朝廷貶謫放逐的地方，古稱龍場驛。據說他那影響深遠的「致良知」哲學便是在這個地方得道的，是所謂姚江學派。「致良知」是以默坐澄心爲主，認爲是非善惡，可於「良心」發作處獲得公正答覆，「良心」有時會爲外來誘惑或壓力所蒙蔽，而令人作出違背良心的事來。違背良心的

事有因不自知而犯的錯誤，也有明知故犯的。前者猶可補救，一旦良心發現，便可改正。若明知故犯，則係良心泯滅，罪大惡極，社會國家的力量便必須出而除暴安良，乃有法律的必要。法律所不能及者，則有宗教上的天法神規來勸善止惡。一般宗教上的勸善止惡方式是假藉神力，告訴你害人終必害己，善惡因果相報，天網恢恢，無人能逃得過神的掌心，雖然他可能逃得過國法和社會的制裁。筆者認爲「神」的所在，便是良知。因下賤的人們可以以欺騙、掩飾等方法從事違背良心的事，以逃脫國法和社會的制裁，目的易達，人人有此可能。故西方宗教家乃將此「良心」加以人格化，敬之爲「神」，跳出了個人力量所能掌握的範圍。王陽明認爲人人都有「良心」，只是有時會被「惡心」所蒙蔽。故主張默坐澄心以喚起良心的復活或功能。良心的功能，也都是人人一樣的，即「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些現象便是。但人類中永遠有違法亂紀，無惡不作的人。他們違背自己良心，文過飾非，自圓其說，這樣自然可能蒙蔽執法當局或社會大眾，而自以爲得。但宗教上的「神」，却是無處不在，你如果信神，便會怕神的威力而不敢抹煞良心文過飾非，自欺欺人。因爲神與你同在，且居於你的良心深處。你如果受到魔鬼的誘惑，想做壞事，便是你良心迴圈的烏雲黑暗開始包圍你，使你是非善惡之心喪失，乃爲所欲爲，睚眦殺人放火，姦淫偷竊的事都可幹得出來。良心未死的人，會在心萌殺機的時候猛省，而及時改變，所以佛教有「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之諺，亦即良心發現殺生之非是也。基督教重視「禱告」，即是要你與你所信的神交通，因爲神無所不在，無力可及，而且就居住在你的良心深處。祂對你禱告的答覆或指示也是透過你良心的。所以事實上也是在「致良知」，不過因爲這個良心已經人格化了，祂高高在上，威力巨大，無遠弗屆，而隨時隨地默默地跟在你的背後；只要你一念信神，便不致於向魔鬼（罪惡）屈服做違背良心的事了。而且當你遭遇到非神論者，或喪失了良心的惡人誤解、詆毀、陷害，甚至喪失生命、事業、財富於惡者之手，即令國法也被蒙蔽，作出不公平的裁判，總總一切，只要你真是一念信神，便不會覺得冤枉，覺得痛苦，患得患失，如喪考妣了。自然更不會尋仇報復，造成冤仇相報的局面。

因爲，事實眞象，有神知道，神是代表是非善惡的眞理，則何須辯解，徒費精神喉舌呢！所以宗教可以彌補國法之不足，收安心定心之效。雖然，皈依宗教的人，也有明知故犯，違背良心和神意的人，但有宗教信念總比無宗教信念好。多多少少總會有些敬神畏神的人，良心未死，不致使社會成爲衣冠禽獸的世界。加以違背良心或神意的行爲，終必受到良心的懲罰，也就是神的懲罰。到頭來都是得不償失的。中國有「三思而行」這句話，便是「致良知」的一種方式，基督教的禱告、佛教的打坐、印度的瑜珈術都與良心有關。所以一個有良心的人，必然是心安理得的人，也必定可以成爲一個好的教徒。

師部決定在陽明洞召訓我們這批「優秀青年

「，自然也是希望我們緬懷先哲，面對現實，喚起「良心」，為戰後多難的祖國奮鬥。對我來說，實在是一件興奮的事。」

陽明洞實際上是一個丘陵地帶。位於修文縣城外約十里處，那時已有一條碎石公路從貴陽通到修文，這個由幾個小丘連成的聖地，就在公路旁邊。小丘間已建有幾棟營房，平日好像是由直屬師部的特務連駐紮。真正的「洞」是在一個較大的山丘上，似乎是一個石鐘乳一類的天然岩洞，面積約一個足球場大小，洞外建有古色古香的陽明紀念祠，藏有一些陽明先生的字牒文稿之類。我們來此受訓的人總數才不過百人，時間是兩個星期。師長以下各級重要長官都來講過話。現在回憶起來，只記得許多人都試着講解陽明哲學中的良知良能，把它與戰後國家形勢連在一起，要大家激發起救國愛民的良知良能，正視潛在的內亂危機，保持勝利的成果。這是我戰後第一次聽到八年艱苦抗戰勝利的成果，已有人要破壞奪取。那時正是政治協商會議之前不久，全國都沉醉在虛幻的和平團結氣氛中，即令在這麼一個極為機密的訓練場合，教官們都不敢直接指出破壞勝利成果的威脅是來自中共。很少有人直接提「中共」的名而指其非者。大概是遵照政府指示，不要造成破壞和平團結的藉口吧。這也顯示政府在戰後委屈求全的一片苦心 and 誠意，與過去幾次國共合作的態度是一致的。

訓練期間，我們除了聽到或看到有關戰後如何建設祖國，消除貧窮，躋國家於世界強國之林的言論和資料外，也很少聽到教條式的口號，更

沒有人主張要消滅共產黨，置國家於國民黨獨裁之下。相反的，有些教官倒是在忠心誠意地大吹憲政的光輝遠景，認為勝利的來臨，已使孫中山先生所訂的軍政訓政，畢其功於一役。雖然也有一些對中共和國情瞭解較深的人，在談到國家的前途時，流露出無限的隱憂，主要是認定「共產黨」是一種不能容納異己，「唯吾獨尊」到了極點的政治和思想團體，而且也是由一批野心勃勃、不甘屈就和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領導。就是執政的國民黨願意與它平分天下，它也是不會滿足的。即令把天下全部給它，恐怕它也不能安份份地過日子，享太平。因為理論上他們是懷抱着許多不易實現的幻想而缺乏信心的一羣。就是得了天下，幻想不能實現時，它又會找藉口，動刀槍，整得雞犬不寧。這也就是毛澤東「不斷革命論」的基礎。想不到當時被認為「反動」、「落伍」、「不民主」的這種論調，後來都一一實現，絲毫不差。

其實，那也不是什麼先見之明，或不幸而言中，而是中外政治史上的經驗之談，幾百年前就有人談過。十四、五世紀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前後的許多歐洲學者，便多痛陳「專制」與「暴君」的連環性，而主張所謂開明專制，或君主立憲。到了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洛克、法國的孟德斯鳩、盧梭，以及美國佩英、傑佛遜和麥迪遜等人，都認定必須建立一種制度，才可抑制和均衡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力慾望和獨佔個性，否則社會國家大事，永不可能有安定和諧之日。因為人人好權的結果，便是鬭爭不息，政權轉

移的形式，永遠止於「改朝換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換湯不換藥」、「一個暴君接替另一個暴君」、「一個專制獨裁者，接替另一個專制獨裁者」，受罪吃虧的，永遠是被治的平民。因之才有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思想理論發生，才有分權學說和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 制度的建立，解決了人類歷史上因政權的爭奪而打破人頭，殺人盈野的問題。中共以殺人盈野的方式取得政權，必以殺人盈野的方式控制和保持其政權，何須置疑和驚異。半世紀來的事實已是足夠的證據了。這是中國人民何等的不幸啊！有良知的人，相信不會以我上面的這些話為偏見，為政治宣傳；當我寫出上面的這些話時，我曾經「默坐澄心」地沉思過，那不是良心話？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良心被權力慾望所蒙蔽的人，則必然要找藉口曲解我說那些話的動機和目的。污蔑我在替某人某黨作宣傳。那真是只有上帝知道

了。

我為何要做那種勞而無功的事呢？我今天既不為名，也不為利，而且謀生國外，舒舒服服，也無需任何名利。況任何名利，也不足以使我個人生活和感受，比現在更輕鬆快活呢！我說那些話，只是聊表一個海外知識分子對國事的關切，敢憑良知說些建設性的話而已。因為假如我今天還在臺灣擁有一官半職，說那些話，人家必以為我在討好當權者，想升官發財，我也只能啞子吃黃連，有口難辯。我若是在大陸說那種話，則不是被下放勞改，便是被扣上反動分子之名或以叛國罪而槍斃。所以，我常覺得，海外知識分子受

到外國憲法人權條款的保障，有說良心話的權利和自由；若還不敢說，還要違背良心說言不由衷的話，實在未免有冒作爲知識分子的榮銜了。中國有所謂：「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士可殺而不可辱！」以及文天祥正氣歌內所提到的那些爲真理正義而犧牲的先聖賢賢，都是代表着讀書人應有的骨氣，甚至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吳晗，也能說出：「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壯語。他們在專制暴君屠刀之下尚敢憑良知良能說話做事，我們在自由世界的人還不敢嗎？

三、立正代替默坐澄心

在陽明洞受訓期間最別致的一件事，似乎是受陽明哲學「默坐澄心」的影響。晨起飯前，不在部隊時的跑步或爬山一小時，而是由各人於盥洗之後，選擇一個地方去「澄心」，但不是王陽明的「默坐」方式，而是步兵操典上的「立正」方式，故可說是「立正澄心」。時間也是一小時。這可不是一回簡單和容易的事。你要挺胸直背，頂天立地的規規矩矩站立在一個地方一小時，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和修養的。開頭許多人都感到是一種變相的處罰，雖沒有「兩腿半分彎」或「雙手舉槍原地站」那麼難過，但也不好受。事實上除了雙手不要舉槍外，與「原地站」的處罰是不相上下的。

不過由於與罰站的動機和原因不同，個人的感受亦異。認爲是在受訓、靈修或練功夫。經過幾次磨練後，居然大家都習以爲常了。

每天晨熹初曙，到旭日高昇之時，只見溪畔

樹下，巖角籬邊，到處都是肅立有如磐石的青年人，在那裡「立正澄心」地「致良知」。沒有人來檢閱、監督，都是自動自發，自己控制時間，到一個小時完畢，然後去讀一陣書，或打一陣太極拳，到七點半鐘去飯廳吃早餐。八點開始上課，下午開討論會，各種有關建軍建國、個人前途，和復員後如何聯繫的問題，都是討論的對象。大家都是滿腹經綸，多的是意見。現在回憶起來，雖覺得有些同志仍脫不了「唯吾獨尊」的毛病，發起言來，氣吞河嶽，好像只有青年軍是愛國的，政府應如何如何重用等等。但也覺得是十分可愛的，真有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氣概。對國家和自己的前途，是那樣地充滿着信心，充滿着主意。

半個月的革命洗禮，時間雖短，確也有許多啓示和鼓舞的作用。大家都懷抱着美好的記憶和憧憬回到原來的部隊，把所謂陽明洞精神——報國的良知良能傳播給同志們，大家興高采烈地回營等待和準備復員之日（六月三日）早些到來。

復員生活兩年 青中教育成功

陽明洞的訓練可說是我青年軍生活的尾聲。緊接着便是填寫復員志願表格等等。軍中充滿着一片勞燕分飛的氣氛，各人各懷大志，政府也特別優待我們，儘量滿足我們的要求，各種志願都予採納，留營、升學、還鄉、入軍事學校深造、去邊疆衛國……等等，不一而足。這恐怕也是國軍史上最民主、最有組織、規模最大的一次解甲復員運動。

我原來是雄心勃勃，志在遠方。想參加邊疆大隊去新疆守土衛國，開創事業，成爲今日的班超、張騫。一方面是自己的志趣，另一方面是我有一個大哥，名霖蘇，軍校十四期畢業，戰時隨十一集團軍在滇西怒江前線服役，轉戰龍陵，畹町、緬北一帶。戰後接收青島，在濰縣受降。應其老長官原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後充新疆警備總司令的宋將軍之召，在新疆輪臺、和闐一帶作國軍的團長。常使我對那遙遠的古西域地方充滿着羅曼蒂克的嚮往。那神秘的天山瀚海，和美目盼今的維吾爾族姑娘，對一個十七八歲的內陸青年具有無限的神秘感。所以我與幾個志同道合的戰友，都填了去邊疆的志願。無如不到幾個星期，從新疆來的消息是：政局不穩，蘇聯野心復活干涉，國府發展新疆的計劃遭遇挫折，青年軍去邊疆的事也只能作罷。（註：後來又恢復了邊疆大隊，我師有一、二百人參加，包括我的戰友多人。但他們在甘肅蘭州會合了其他各師的志士，要往新疆出發時，也受到阻撓。他們不顧一切地前進，車隊到達甘新邊界的猩猩峽時，竟被叛軍狙擊，狼狽折返。）於是我改填入軍校的志願。

政治指導員田適少校，湖南大學畢業，二十幾歲，一個學者型的愛國者，看到我填的志願表後，找我去談話。他先要我說說填寫志願的依據，即爲何要入軍校。我當然說了一大套以身許國的大道理，他聽了也很感動，然後他以極誠懇的老大哥語氣向我分析說：「入軍校自然是報國的有效途徑，不過我要提醒你，就我所知道的你的一切，包括個性、體格、能力、興趣等等，我看

你並不是一個良好的軍人材料。加以戰後國家將全力從事建設，需要各種人才，你這麼年輕，為何不繼續升學，甚至學一門技術，則將來對國家社會的貢獻恐怕要比你當軍人為大。現在戰爭結束了，現役軍人可能已經太多，裁軍之聲已隱約可聞，你不是去趕冷場嗎？……」他這一席話，實在是真摯感人，使我覺得他的分析和看法是正確的，不啻把我從「英雄夢」中喚醒。於是我把志願從「入軍校」改成了「入文學校」升學，目的地是南京的中央工業學校，想學一點工業技術，將來好從事建國工作。

我原來是可以回湖南升學的，何以欲去南京呢？也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想去南京看熱鬧，我知道南京是國家首都，在初中地理書上便知道那龍蟠虎踞的險要形勢，玄武湖、紫金山、秦淮河、燕子磯一類的名勝；明孝陵、中山陵一類的古蹟；加上京畿重地冠蓋雲集，必有可觀。另一個原因自然是因為家叔聖芬先生正服務於最高領袖身邊，常川駐京，也可就近聆訓，獲得啓示。還有一個三兄志淵，也在南京中央日報工作，不時發表一些短文新詩之類，使我非常羨慕嚮往。

快到退伍的時候，中央在國防部成立一個青年軍復員管理局，由蔣經國先生任局長。該局隨即在南京各青年軍所在地成立幾個青年中學，以供退伍士兵中年紀較輕，有志升學的人求學。生活上繼續施以軍事管理，但教育上則照文學校規格，希望培養出一批真正文武雙全的建國幹部。二〇五師所在地的貴州也奉命在貴陽設立一個。由當時新升師長的劉樹勳將軍為籌備主任委員。

劉師長夫婦對我這小兵真是愛護有加，對我的志氣尤為激賞。當貴陽青年中學的設立計劃確定後，劉夫人黃修祖女士便派副官開車到我連上轉達這個消息，並希望我留貴陽升學。但我還是嚮往南京，到退伍手續都辦好，即將出發前往南京的前幾天，劉氏夫婦特別派車接我到他們的公館盛筵餞別。記得那天還有二十多位客人，都是跟隨劉師長多年的參謀人員或親戚。其中有一、二員且是貴陽青年中學籌備工作人員，詳細向我說明該校的計劃和遠景，認為將成為西南最佳中學之一，鼓勵我改變志願，留在貴陽入該校升學。我以一切行程已定，臨時改變，必將增加主辦復員單位的困難。他們告訴我主辦當局早知青年人容易見異思遷，改變主意，已定好了應變手續程序，非常簡單，只須作一報告，經師長或參謀長批准，主辦單位便可照改。這兩位仁兄的遊說，顯然對我發生了影響。當大家酒醉飯飽之後，劉夫人拉了我的手到她的臥室問我，聽到那參謀人員關於青中的談話後，有何反應。她說她十分希望我留在貴陽求學，不但可隨時見面，且可照顧我的成長。她說劉師長和她都對我有很高的期望。情意真摯，有如姑孀。不久，劉師長也進來告訴我，國防部對青年中學很重視，將來師資、設備都不會差。我終於被他們感動，滿口答應。修孀（劉夫人）一聽到我答應留貴陽升學，喜出望外，一時手舞足蹈地奔出臥室，向客人們宣佈這個「好消息」，引起一陣掌聲，真使我受寵若驚。我這時才體會到，由於一年多軍中關係，也可以說是患難關係，加上劉師長與家叔的友情，

劉氏夫婦，尤其是劉夫人，對我這「少年志士」已具有深厚的感情，超過他們對一般部下的關切和愛護，令人感激難忘。

幾天之後，我們正式退伍了，成千上百的軍運大卡車，一隊一隊地排列在營地，去長沙的，去桂林的，去武漢的，去南京的，去重慶的，去蘭州的。這些地名牌高高地樹立在車隊的前面，象徵著祖國河山的遼闊，也說明青年軍成員散佈的廣泛。復員的情緒是熱烈的，但「復員不是復原」，也不是「解甲歸田」，而是奔赴一個新的崗位，在新的崗位去發揮一己報國的良知良能。留讀貴陽青年中學的約有一千六百餘名，都是年紀較輕的人。由於六月初正是暑假期間，也是正值青中籌備期間，當局為恐我們無所事事，便在貴筑縣麥家橋原來營地，以美軍大帳棚為宿舍，將小溪修建擴充為活水的游泳池，僱用了許多貴陽能找到的體育、文康戶外活動專家，辦了一個節目內容十分豐富和够水準的夏令營。我們從單調嚴格的軍隊生活，一變而為多姿多采的學生生活，大家都覺得輕鬆愉快，好像回到了童年。夏令營中除了上述的康樂活動外，上午還有各科的補習教育和甄選考試，以備吾人秋季入學時，不致有跟不上班的困難。我因從軍前已初中畢業，所以復學時，順理成章地從高中一年級開始。貴陽青中設在離城十里的南廠兵營，原係該省軍人練兵之地。建築牢固，一棟一棟的兩層方形樓房排列整齊。樓上樓下一邊是寢室，一邊是教室，每棟房子可容納兩個班級，設隊長一人，來自軍中，負管理之責。我們於一九四六年八月

中搬進學校，兩週後便開始了別開生面的學習生活，也可說是允文允武的生活。

我校因係國防部特設，經費較一般中學充裕，教員薪俸也略高，所以吸收了優良教師。有三分之一是從貴州大學和貴陽師範學院請來兼課，本地中學的一些有名教師，也幾乎網羅殆盡。

由於學生們都是久經患難的青年，有過求學無門的經驗，一旦復學，大家求知慾都空前高漲，殊非一般中學可比。又因住校生活受軍事管理，除了埋頭用功外，少有外務，也不愁一切，大家學業都進步神速，委實沒有辜負國家培植之恩。可惜內戰烽火日益蔓延，眼看着勝利帶來的歡愉興奮之情，漸漸地從大家的心頭上消失，而為一種消極徬徨的情緒所取代。一片一片的美好河山，文物設施，遭受到中共的瘋狂破壞。戰時多年流離未定的苦難同胞，又要面臨家破人亡或流離失所的命運。而各級軍政黨務負責人員有的還是醉生夢死，或是得過且過，士氣不振，民心頹廢，恰好為中共黑暗時代的到臨鋪路。

一九四八年徐蚌會戰失敗，京滬危急，一九四九年元月蔣公下野，政府南遷，我校經費斷絕，奉令停辦。我高中才讀兩年，再一次地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青中兩年的教育對我是有成就的。我從軍前的學術基礎除國文一科因受家庭影響尚不輸人外，其他方面都十分薄弱。加以戰亂流離，和從軍多年的荒廢，復學時可說已不知功課為何事。但一股強烈求知的慾望，和熱切報國的大志，驅使我孜孜矻矻，勤學不倦。不但很快把「放心」收回，把遺忘了的基本知識重新拾起，

而且常常超越教師的要求，不斷尋求課外知識，一天當兩天用，兩年下來，成績斐然。除了課本上的知識一點也不放鬆外，我還特別鞭策自己朝「德」、「智」、「體」、「羣」四育並進的方向奮鬥。我參加有益的課外活動，如演講比賽、作文比賽；我不忽視體育，為排球校隊選手之一；我為同學愛戴，經常當選級長和全校學生自治會主席等等。就在我當全校學生會主席的那段時間，好像是一九四七年，全國各大城市學潮洶湧，罷課遊行，反饑餓、反內戰、反美反日，一切都在中共和其同盟人：包括民主同盟、無黨無派，也就是所謂「黨外人士」，以及一些不滿現實，自命為前進的大學教授、文人作家、藝術工作者和失意政客們的鼓動操縱之下，把一切因八年抗戰而造成的社會動亂、經濟蕭條的責任推到執政的國民黨頭上，所以，一切的「反」，也就是反國民黨，反政府，反領袖。

年輕無知的中學生，惟恐天下不亂的地痞流氓，一知半解的大學生，在那些人的煽動領導下，真是表演得精采到了極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對政府而言，就像是一棟衰頹的老屋，要被人拆去重建。拆屋的工人羣，從前後左右上下，四面八方加以圍攻，你拉我推，你撻我打。再不倒塌，則安裝炸藥，加以爆破。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就是這樣不明不白，一窩風，一面倒的情勢下被這些人推倒的。

我們這一千多名從青年軍復學的青中學生，就以我為代表來說，對國家忠心耿耿，早已以身許國，無任何貪婪慾望。既無財產，也無地位，

只希望國家強盛，人民安居樂業，使後代讀歷史時，不再是一連串的國恥紀念日。也不必天天被這人煽動，被那黨蠱惑，去打倒這人，去打倒那黨。去街上遊行示威，打警察、喊口號，永無寧日。又由於我們從近代史中瞭解到的國家悲劇、革命思想、黨派背景，較一般人深，加上自己實際行動的經驗和見識，始終認為國民黨的一切比其他黨派正派，當時的領導人物也具有實現總理遺教的誠意。就以我們這些受國民黨政府訓練出來的基層幹部而言，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我們未來的責任是擁護和保衛國民黨的專政，為蔣主席充當打手，像紅衛兵替毛澤東當打手一樣。即令我們之中有種自命忠貞，要擁護和驅使國民黨獨裁的人，教官或領導人物總是分析作結論說：「正如國父一再強調，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所趨。三民主義是以『民』為本，順應世界潮流的民治、民有、民享的主義，國民黨既以實現三民主義為宗旨，便必須走民主自由的道路，反之，便沒有僥倖成功的機會。其他各黨派政團的宗旨也必須以民主為依歸，否則終必歸於失敗。」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聽到這種話，不要說國民黨的總理遺教提倡民主，總裁訓示裏也一再地講民主。甚至低層而有見識的幹部也無不以實現民主為鵠的。

我至今還記得一位在國民黨搞特務起家，能言善說，後來在臺當過立法院院長的劉健羣先生，在貴陽青中演講時，曾興奮地向大家描繪戰後憲政實施，國家走向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的美麗遠景。但他也毫不隱瞞地警告大家，那時還存在着實行民主的大敵和障礙，那便是中共的叛亂。

如何加以掃除以實現民主，乃為當務之急云云。許多思想超越時代的同學，曾認為他對民主的解釋言不由衷，那也是當時流行的自由式民主思想，既然民主，便不必刺共，而應邀請大家，包括中共，組織聯合政府才對。連美國盟邦也有這種想法。現在事過三十多年，我確有機會博覽羣書，俾獲政治學博士學位，週遊列國，略識時務；在彼邦大學教政治學又是十五年，回頭看那段祖國歷史，仍然深信為國家長遠利益計，國民黨當時的政策，以及今日的作法，是沒有什麼大錯的。假如當時真與中共成立了聯合政府，恐怕國民黨早已分化吞滅，那會有今日臺灣中興的局面？臺灣如不存在，中共更加虎添翼，為所欲為，唯吾獨尊，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都不會有比較批評的客觀標準，而一任中共自吹自擂，自欺欺人了。戰後還有許多事表示國民黨有實現憲政的心向。一是在公共場所，黨旗不再與國旗並列出現。談話中也不再是黨、黨、黨，而是以國家為重，即令在其黨內訓練班也是這樣。其次是在中共威脅，社會動亂嚴重的時候，召開國民大會，舉辦選舉，且在國代預留名額歡迎中共參加等等，實在也是仁至義盡了。無如中共的「唯吾獨尊」與「不共戴天」的決心和行為，較國民黨還大一百倍，終於使內戰無法避免。而執政的國民黨一面要搞民主，一面還要討好已結盟邦，受其壓力，結果是民主既難實現，獨裁又不徹底，而予中共以可乘之機。

我們當時雖然是才不過二十左右的青年，但對政治現實却有相當瞭解。除極少數自命前進的

人以外，大多數都是同情政府的，認為戰後中共如不叛亂，與政府和衷共濟，國家不數年便可強盛復興。所以，當全國學潮澎湃之際，我們獨特異議，呼籲各級學校冷靜，我們要在「安定中求進步！」安定第一，沒有安定，一切計劃都是空談，則進步從何可能？三十多年來海峽兩岸的情形便是鐵的答案。記得當時貴陽除有幾十所中學外，大學有貴州大學（在花溪）、貴陽師範學院、貴陽醫學院等等。他們自然也是受到北平、京滬一帶學潮的影響，要在貴陽發動。當時貴州省主席楊森將軍、教育廳長傅啓學先生，因讀到我們「在安定中求進步」反學潮宣言，不但深為感動，而且倍為重視。一有貴州大學等發動學潮的情報，便打電話給我們的校長孫樂陶先生，孫校長便派人找我（學生會主席），我隨即召開班代表會議。經過一番討論，分配工作，寫標語的寫

標語，招待記者的招待記者，到各校聯絡的去各校聯絡。因為大家都是住校，無牽無掛，集合容易，行動迅速，總是在貴州大學的遊行示威還沒有組織成功以前，我先來一個反學潮集會或遊行，聲勢浩大，硬把那些自命前進的份子嚇阻下去。後來我入臺大，正逢傅啓學先生作訓導長，談起這段往事，猶不勝懷念。據他告我，政府撤離大陸前，全國各大城市，除了貴陽以外，沒有一個地方未曾發生過學潮。我至今認為我們當時的行為是正確的，假如全國同胞人同此心，不受所謂前進份子蠱惑，在政府領導下齊心合力從事建設，憲政必早已實行於全國，經濟建設必已有勝過臺灣的成就。何以言之？在內戰中雙方所耗去的國家財富及生產能源，何止是經建所需？以此從事建設，不是成就可期嗎？哀哉！中國人民之悲局，何時得了！（未完待續）

聖文
文庫

少年行

全一冊
隆重出版

曹志源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作者以優美的文藝筆調，對多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眾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